

# “为郢”地望考论

晏昌贵 罗丹<sup>1</sup>

**【摘要】**“为郢”作为清华简《楚居》篇记载最多的王居，很有可能是春秋时期楚国核心都城之一。综合相关传世文献的记载和考古调查资料，为郢地望当在沮漳河以西，或即今湖北当阳季家湖古城遗址。为郢的设置和使用经历了一个动态过程，是春秋时期楚国在汉西地区发展的集中反映。

**【关键词】**《楚居》 为郢 季家湖古城

**【中图分类号】** K225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** 1003-8477 (2022) 03-0110-11

由于史料不足，先秦时期楚国都城的情况，历来聚讼纷纭。清华简《楚居》的公布，虽为楚国都城研究提供了新材料，但由于其内容多不见于传世文献，难以考实，又增添了许多新疑窦。在《楚居》中，为郢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，其作为王居始自楚文王而止于楚惠王，前后近二百载。其间楚王或长期居于为郢，或在为郢与其他居地之间反复迁徙，毫无疑问，为郢是春秋早期至春秋、战国之际楚国最重要的王居。

与《楚居》中众多地名一样，为郢不见于传世文献，其地望亦尚无定论，主要观点有四：其一，蒧邑说。整理者认为“为”“蒧”二字相通，“为郢”可能与春秋时期楚国蒧邑有关，并指出今浙川丹江口水库一带有蒧氏家族墓地；<sup>[1] (p188)</sup>黄灵庚亦持类似观点，只是认为蒧邑应在今湖北京山市西百余里的汉水东岸。<sup>[2] (p53-106)</sup>其二，郭家岗说。赵平安从楚文王居地分布出发，认为“为郢”应在樊郢所在的今湖北樊城附近，进而分析灵王时期乾溪之乱相关史实，认为“为郢”就是《左传·昭公十三年》中所记的“鄢”，并依据《说文》段注，最终将为郢定于宜城西南的郭家岗遗址。<sup>[3] (p8-10)</sup>其三，楚皇城说。对于赵平安将“为郢”释为“鄢郢”，学界支持者众，如牛鹏涛、<sup>[4] (p36-37)</sup>辛德勇皆同意此说，<sup>[5] (p76-91)</sup>但对其具体地望，则尚有异议。赵庆森认为，《说文》段注乃沿袭《括地志》误说，据北大水陆里程秦简中有关“鄢”的里程记载，鄢郢当在宜城楚皇城遗址。<sup>[6] (p25-28)</sup>事实上，在《楚居》公布前，学者已有考证鄢郢即楚皇城遗址。<sup>[7] (p62-67) [8] (p32-33) [9] (p93-95)</sup>赵思木在研究中亦采纳了赵庆森的观点。<sup>[10] (p445)</sup>其四，季家湖古城说。笪浩波将传世文献中楚文王、庄王、昭王转战的地点，与《楚居》相比勘，认为“为郢”应当靠近长江，同时临近漳水、沮水，进而考证沮漳二水，指出季家湖古城可能就是为郢所在。<sup>[11] (p27-33)</sup>

总的来说，自从赵平安提出为郢即鄢郢，学界对为郢地望的考证基本是以此为前提的，在具体地望上又多倾向于赵庆森提出的楚皇城说。然而学者们并没有深入考察为郢与鄢郢是否真的等同。笪浩波试图从楚文王、庄王、昭王时期的战事入手提出新见解，但由于相关古地名本来争议较大，同时《楚居》所载楚王迁徙时间不明确，也不便与传世文献中的楚王行军范围比对，因此其论断受到学者质疑，<sup>[10] (p445-446)</sup>但并非没有进一步探讨的价值。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，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，对为郢地望再作探讨，就教于学界方家。

## 一、为郢的使用年代与性质

准确把握为郢的使用年代及性质，是推测其地望，尤其是将其与考古发现相联系的前提。据简文记载，为郢作为王居始自文王，简8—9记：“至文王自疆涅徙居淋郢，淋郢徙居樊郢，樊郢徙居为郢，为郢复徙居免郢，焉改名之曰福丘。”<sup>[1] (p181)</sup>楚文王徙至为郢的时间无明确线索。文王在位约十五年（前689—前675年），<sup>1</sup>其间凡五迁，为郢或为其晚期居地，居住时间可能并不

<sup>1</sup>作者简介：晏昌贵（1965—），男，历史学博士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（湖北武汉，430070）；罗丹（1990—），女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（湖北武汉，430070）。

长。据《左传》，文王十四年（前 676 年）巴人“门于楚”，次年春文王败于津，欲还都而不得，又北上伐黄，归途中卒于湫。<sup>[12] (p1773)</sup>这里巴人所攻之楚都，以及文王伐黄后欲归之楚都，明显是文王时期最后一个居地免郢，那么至迟在文王十四年，为郢已非王居。

文王之后，幼子堵敖即位，从免郢（改作“福丘”）迁居都郢，后为其弟成王所弑。有关成王居地，简文记曰：“至成王自都郢徙~~淝~~郢，~~淝~~郢徙□□□□居睢郢。”<sup>[1] (p181)</sup>关于此处阙文，整理者认为约残去五字。朱晓雪通过与完整竹简比对，同时参考残简本身字间距，认为应残去四字。<sup>[13] (p417-419)</sup>赵思木认为阙文首字应是“居”或“徙”，最后一字只能是“徙”，中间两字应该是有重文符号的地名。<sup>[10] (p447)</sup>至于阙文中带有重文符号的地名为何，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七年》记楚王将围宋，命子文治兵于睢、子玉治兵于蔿。<sup>[12] (p1822)</sup>子居、陈民镇认为这里的“睢”“蔿”即《楚居》之“睢郢”和“为郢”，其中子居认为睢可能就是僖公二十六年楚国所灭之“夔”，楚成王先是徙居为郢，灭夔后置为睢郢。<sup>[14] [15]</sup>魏栋进一步指出，睢郢、为郢两地可能存在空间上的邻近关系，并且为郢曾为多位楚王居地，前述简文所缺中间二字可能就是“为郢”，残简阙文当作“徙为=郢=徙”。<sup>[16] (p42-47)</sup>然而正如赵思木所言，睢、蔿二地虽然相近，但其地望尚难以确定，是否即睢郢亦缺乏足够证据。<sup>[12] (p448)</sup>仅以此而言，并不能判断成王是否曾居于为郢，暂且存疑。

成王之后，穆王、庄王皆有徙居为郢的记载，简文曰：“至穆王自睢郢徙~~淝~~为郢。至庄王徙~~淝~~樊郢，樊郢徙居同宫之北。若敖起祸，焉徙居承之埜（蒸之野），承之埜□□□，□~~淝~~为郢。”<sup>[1] (p181)</sup>穆王在位约十二年（前 625—前 614 年），居两地，但究竟何时徙居为郢，文献中并无相关线索。按《楚居》体例，楚王即位之后一般写作“至某王自 A 地徙居（徙）B 地”，A 地即为前任楚王最后一个居地。《楚居》载庄王继位以后迁居樊郢，而未提及穆王所居为郢，这意味着庄王即位初期可能并未居为郢。据《左传》，若敖氏之乱发生于庄王九年，<sup>[12] (p1869)</sup>其后庄王徙居蒸之野，徙居为郢则更晚。简文中“承之埜”与“徙为郢”之间缺四字，根据《楚居》文例，前两字应为“徙居”或“徙徙”，最后一字应为“徙”，第三字很可能为带重文符号的地名。赵思木认为其可能是某郢的简称，朱晓雪则认为很可能是简 15 中的“郢”，<sup>[13] (p417-419)</sup>可备一说。如此一来，为郢则是庄王时期第五个居地，其使用时间当为庄王后期。

简 11 记楚共王至灵王居地曰：“至共王、康王、𤄎（嗣子）王皆居为郢。至灵王自为郢徙居乾溪之上。”<sup>[1] (p181)</sup>其中嗣子王，即传世文献所载康王之子“郑敖”。整理者指出，“𤄎”字下面有合文符号，为《说文》嗣字古文，读作“嗣子”，嗣子王之称当是针对非嗣子的嗣王而言。<sup>[1] (p189)</sup>自庄王末年居为郢以后，楚共王在位约三十一年（前 590—前 560 年），楚康王在位约十五年（前 559—前 545 年），郑敖在位约四年（前 544—前 541 年），皆居为郢，未曾迁居，且据《楚居》记载，楚灵王早期亦居于为郢，那么为郢在春秋中晚期作为唯一王居至少有五十余年。灵王后期，由于经营淮域和吴楚战争的需要，徙居乾溪之上，但为郢似乎仍是政治中心。灵王十二年，公子比和公子弃疾叛乱，《左氏会笺》“以入于楚”条曾云：“时灵王在乾溪，故趁虚以入，夺其巢穴也。”<sup>[17] (p6)</sup>叛军的目标应即灵王故都为郢。

此后楚平王即位，简文言其“犹居乾溪之上”，似乎乾溪之上是其唯一居所。然而从楚平王早期的政治形势来看，其居乾溪之上的可能性并不大。楚平王“以诈弑两王而自立”，由于“恐国人及诸侯叛之”，施行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措施：对外，“复陈蔡之地而立其后如故，归郑之侵地”；对内，“存恤国中，修政教”。<sup>[18] (p1709)</sup>同时，为进一步“息兵”“抚民”，分别令然丹“简上国之兵于宗丘”，令屈罢“简东国之兵于召陵”。<sup>[12] (p2076)</sup>概而言之，平王初年政治重心在于稳固内部统治，暂时放弃了在淮域的扩张，对吴国也以防守为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楚平王当无必要亦不可能远离楚国核心区。虽然《楚居》无载，但平王初年很可能依然居于为郢。

昭王即位后，先后从乾溪之上徙居嫩郢、鄂郢、为郢，“阖庐入郢，焉复徙居乾溪之上”。<sup>[1] (p181)</sup>整理者指出，阖庐所入之“郢”即“为郢”。辛德勇认为从《楚居》前文“氏（抵）今曰郢”四字来看，这个“郢”字是楚都专称，指楚国始都之郢，即疆郢。<sup>[5] (p76-91)</sup>然而细究其意，这一段其实是作者解释楚“郢”字的来历，不是专指一个地名，“氏今曰郢”意为“至今楚都被称为郢”。<sup>[10] (p439)</sup>《楚居》还有所谓“氏今曰楚人”“氏今曰蔡”，每一句“氏今曰”之前都有一段详述来由的故事，当理解为作者解释“楚人”“蔡”的含义。如果简文中的“郢”并非专称，那么“阖庐入郢”之“郢”更应该与此前楚昭王居地密切相关，

指的是前一句吴人进攻以前楚昭王所居住的“为郢”。<sup>[19] (p37)</sup>昭王之后，惠王“自嫩郢徙袭为郢”，<sup>[1] (p181-182)</sup>白公胜叛乱后，“焉徙袭淋郢”。<sup>[1] (p182)</sup>此后，为郢再未有作为王居的记载。

从文王到惠王，至少九位楚王有明确记载曾居为郢。其中庄王及其以前的楚王，在位期间往往迁徙次数较多，为郢既非唯一居地，亦非迁徙中心，尤其继任楚王往往从前任楚王居地迁出。如文王最后之居地在免郢，而堵敖即位以后从免郢迁出；成王最后之居地在睢郢，穆王即位以后从睢郢迁出；穆王最后之居地在为郢，庄王即位以后则迁至樊郢。从庄王后期徙居为郢一直到灵王前期，为郢作为唯一王居达五十余年，昭王、惠王时期仍间或徙居于此。那么应如何看待为郢的地位呢？

在传世文献中，涉及楚都多单称“郢”字，早期研究多将其理解为一固定都城。近年来公布的楚地出土资料出现有更多称“郢”的地名，尤其《楚居》记载楚王在位期间常常在诸“郢”之间迁徙，如若全部理解为都城，楚国迁都似太过频繁。整理者将这些地名统称为楚王居地，认为“郢”不是一个固定地名，而是武王之后王居的通称。<sup>[1] (p188)</sup>尹弘兵则指出“郢”至少有两层含义：一指楚国都城，即郢都；二指楚王处理政务之地。<sup>[20] (p46-57)</sup>其说颇有理，诸郢设置可能与楚王治政有关。并且庄王以前，楚王在诸郢之间频繁迁徙，为郢只是其中之一，楚国在当时可能并未形成单一的都城核心区。自庄王后期迁居为郢，到惠王时期迁出，为郢成为拥有特殊地位的中心都城。根据吴人入郢后“以班处宫，子山处令尹之宫”的描述，<sup>[12] (p2136)</sup>当时为郢有王宫等建筑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在记载惠王时期白公之乱时，亦提及为郢中有“朝”“昭王夫人宫”。<sup>[18] (p1718)</sup>质言之，作为中心都城的为郢应是当时楚国王宫、宗庙之所在。正因如此，灵王时公子比叛乱，以及昭王时吴人伐楚，目标皆是为郢。筮浩波曾指出为郢的鼎盛时期在春秋中晚期，<sup>[11] (p27-33)</sup>王琢玺认为“为郢”有可能是楚国春秋中晚期都城，<sup>[21] (p92)</sup>这些看法是较有道理的。

在明确为郢的年代与性质后，要分析其与考古所发现城址的关系，还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为郢本身是否筑城。检相关史料，春秋时期楚国郢都是明确筑城记载的。《左传·文公十四年》载：“楚庄王立，子孔、潘崇将袭群舒，使公子燮与子仪守，而伐舒蓼。二子作乱，城郢，而使贼杀子孔，不克而还。”<sup>[12] (p1854)</sup>此为郢都筑城的首次记载。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载：“（楚康王元年）楚子囊还自伐吴，卒。将死，遗言谓子庚：‘必城郢！’”杜预注：“楚徙都郢，未有城郭，公子燮、公子仪因筑城为乱，事未得讫。子囊欲讫而未暇，故遗言见意。”<sup>[12] (p1959)</sup>此前庄王时期公子燮等人筑城一事似未成，楚郢都筑城时间当自子囊去世之后。楚平王时期，对吴战事不利，《左传·昭公二十三年》载：“（楚平王十年）楚囊瓦为令尹，城郢。”杜预注：“楚用子囊遗言，已筑郢城矣。今畏吴，复增修以自固。”<sup>[12] (p2102)</sup>根据为郢的使用情况，其城址之年代上限很可能在楚康王时期。

尹弘兵指出，鄂西地区有三大反映楚文化核心区的东周聚落群，分别为今宜城市南部、南漳县东部的蛮河流域聚落群，沮漳河中游以当阳季家湖古城为核心的东周聚落群，沮漳河下游以纪南城为核心的东周聚落群。<sup>[22] (p237)</sup>为郢作为楚国春秋中晚期核心都城，应当就在这三大聚落群之中。在现有为郢地望诸说中，宜城楚皇城遗址虽出土有春秋中晚期器物，但其城址上限在战国早期，<sup>[23] (p377-382)</sup><sup>[24] (p108-113)</sup><sup>[25] (p26-37)</sup>郭家岗遗址年代跨越西周晚期至战国晚期，但未筑有城墙，<sup>[26] (p515-551)</sup>二者皆与上述为郢年代不甚相合。江陵纪南城城垣的始筑年代不早于战国早期，<sup>[27] (p11-21)</sup>城址与宫殿的使用年代主要在战国中晚期，<sup>[20] (p46-57)</sup>亦难认定为郢。唯有当阳季家湖古城，其年代为东周，遗址内出土有春秋中期器物，<sup>[28] (p31-41)</sup>与为郢年代相合。那么为郢是否在季家湖古城？

## 二、灵、昭两代史事与为郢地望

当前学界主流观点将为郢定于宜城一带。而据上文，从现有考古发现来看，季家湖古城相比宜城附近的楚皇城遗址与郭家岗遗址，与为郢更加契合。下面将根据灵王、昭王时期的相关史事，对为郢地望展开进一步分析。

### （一）再议楚灵王乾溪之乱中的为郢

赵平安之所以将为郢定位于宜城，其原因主要有二：其一，为郢与文王时期另一居地樊郢相近，而樊郢位于今樊城，为郢应在其周边；其二，从灵王末年乾溪之乱相关史事看，“为郢”就是传世文献中的“鄢郢”，通过考证后者即可确定前者地望。

<sup>[3] (p5-10)</sup>“为郢”与“樊郢”的空间关系，由于没有确切证据，其实并无定论；对于“为郢”即“鄢郢”这一观点，后续学者无疑

义，只是对鄢郢的具体定位有不同观点。然而仔细分析相关史事，这一观点还存在讨论空间。

楚灵王晚年为经略淮域以及坐镇吴楚战争前线，从为郢徙居乾溪。灵王十二年，公子比、公子弃疾叛乱，事见《左传·昭公十三年》：

楚公子比、公子黑肱、公子弃疾、蔓成然、蔡朝、吴帅陈、蔡、不羹、许、叶之师，因四族之徒，以入楚。及郊，陈、蔡欲为名，故请为武军。蔡公知之曰：“欲速。且役病矣，请蕃而已。”乃藩为军。蔡公使须务牟与史狎先入，因正仆人杀太子禄及公子罢敌。公子比为王，公子黑肱为令尹，次于鱼陂，公子弃疾为司马，先除王宫，使观从从师于乾溪，而遂告之。且曰：“先归复所，后者剿。”师及訾梁而溃。<sup>[12] (p2069)</sup>

概言之，叛军当是乘灵王远在乾溪而为郢空虚，突袭得手，杀死留守的灵王诸子，并占据王宫。楚灵王得知后方叛变，随即由乾溪返回，观从得知公子弃疾已得手，遂在灵王军中号令众人，军队行至“訾梁”（今信阳一带）溃散。此后，《左传》载：“王沿夏，将欲入鄢。”<sup>[12] (p2070)</sup>赵平安认为，此处灵王所要去的“鄢”就是楚都“为郢”，然而从当时形势来看并不合理。当时为郢已为叛军占据，灵王若再赴为郢，不啻自投罗网。据载，当时右尹子革曾建议灵王返回国都之郊，灵王以“众怒不可犯”而拒绝。<sup>[12] (p2069)</sup>这表明，楚灵王此后流亡欲去的鄢地，绝非此前的楚都。辛德勇在赵平安论“为郢”“鄢郢”等同的基础上，亦认为楚灵王将去的是为郢，亦即鄢郢。而叛军所据之郢即《楚居》中的始都之郢（又称“疆郢”），是一座位于江陵的旧都。<sup>[5] (p76-91)</sup>此说虽有可商，但其敏锐地发现楚灵王所去的地点与叛军所据郢都并非一地，是值得肯定的。

由于为郢、鄢郢并非一地，那么为郢自然不可能位于鄢郢所在的宜城楚皇城附近。从当时形势来说，灵王之所以选择前往鄢郢，很可能因其与已被叛军占据的楚都为郢相距甚远，相对安全。而为郢的地望，应从叛军的军事活动来寻找线索。上述引文提及，当时叛军入楚后，公子弃疾为先锋攻入郢都王宫，公子比与公子黑肱驻扎于“鱼陂”。在楚国军事地理中，鱼陂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。《战国策》载：“楚苞九夷，又方千里，南有符离之塞，北有甘鱼之口。”<sup>[29] (p300)</sup>王应麟以为此“甘鱼之口”即《左传》之“鱼陂”，<sup>[30] (p1164)</sup>复指出：“战国多以水攻，故楚守甘鱼之口。”<sup>[31] (p152)</sup>质言之，鱼陂应是当时扼守楚国水路的一处要地。当时公子比驻扎于此，很可能因此处与郢都之间交通联系密切。鱼陂的方位及其周边交通，对于推测为郢地望有极大价值。

据杜预注，“鱼陂”又称“甘鱼陂”，在晋竟陵县城西北。<sup>[12] (p2069)</sup>古竟陵城故址，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江夏郡“竟陵”条下注曰：“章山在东北，古文以为内方山。”<sup>[32] (p1567)</sup>《后汉书·刘玄传》“竟陵”条注云：“县名，属江夏郡，故城在今郢州长寿县南。”<sup>[33] (p468)</sup>鲁西奇指出，章山、内方山，在今荆门马良山一带，竟陵城更在章山之西南，又属唐长寿县南境，其地当在荆门市东南、沙洋县附近。<sup>[34] (p107)</sup>结合北大水陆里程秦简有关秦“竟陵”的记载，古竟陵城应在沙洋镇以南，或即天门与钟祥交界处。<sup>[35] (p274)</sup>《左传·定公五年》载，吴师入郢后，楚昭王从郢都出奔前往随国，曾经渡过“成臼”。据杜预注，竟陵县境有“白水”，发源自聊屈山，西流入汉水，此应即《左传》之“成臼”。<sup>[12] (p2140)</sup>这显示当时竟陵已成为出入郢都的交通枢纽。

竟陵和附近的甘鱼陂之所以成为当时的军事、交通要地，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。关于汉晋时期的竟陵地望，《水经注·沔水（中）》载：“杨水又北迳竟陵县西，又北纳巾、吐柘，柘水即夏杨水也……杨水又北注于沔谓之杨口，中夏口也。”<sup>[36] (p2410-2412)</sup>《水经注·夏水》载：“夏水又东，夏杨水注之。水上承杨水于竟陵县之柘口，东南流与中夏水合，谓之夏杨水。”<sup>[36] (p2709)</sup>据《水经注》两段注文，竟陵、鱼陂显然近于杨口，处在杨水、汉水交汇处。

而《水经注》所载“杨水”，又称阳水、扬水，<sup>[36] (p2404)</sup>《汉书·地理志》南郡临沮县下注：“《禹贡》南条荆山在东北，漳水所出，东至江陵入阳水，阳水入沔，行六百里。”<sup>[32] (p1566)</sup>漳水发源于今湖北南漳，在当阳市境与沮水合，南流入江。杨水则从江陵一带东流至杨口（据竟陵在荆门东南，则杨口当在今荆门沙洋县一带）入汉水。《汉志》记漳水东至江陵一带入杨水，当有人工疏通之水道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引盛弘之《荆州记》云：“昭王十年，吴通漳水，灌纪南，入赤湖，进灌郢城，遂破楚。”<sup>[37] (p2836)</sup>相传漳水、杨水相通始自春秋晚期吴师入郢之役，辛德勇认为盛弘之《荆州记》所言只是吴师决既有渠水以灌郢都，这条渠道当开凿于吴师入郢之前。<sup>[38] (p116)</sup>

可见鱼陂不仅可依靠汉水北通襄宜平原，亦可通过杨水南达江陵，以及更西之沮漳河中游地区，是江、汉间的交通要冲，亦是楚国三大东周聚落群往来之水路枢纽。《左传·昭公十三年》载，叛军入楚前“盟于邓”，据杜预注，“邓”即晋潁川召陵县西南之“邓城”。<sup>[12] (p2069)</sup>显然叛军当在方城关外集结，然后南下入楚，顺汉水抵达鱼陂。公子比之所以驻军于鱼陂，大致有两种可能：一是等待公子弃疾攻郢都之结果，二是截击回师郢都的灵王大军。如果是前者，既然叛军已经深入到杨口一带，其目标显然不在后方的襄宜平原。如果是后者，那么公子比必然驻扎于灵王回师郢都的中途。前文已提及，叛乱发生时灵王远在淮域的乾溪，军队在经过今信阳一带时溃散，其路线当是溯淮河而上，进入楚境。《左传》载：“王沿夏，将欲入鄢。”<sup>[12] (p2070)</sup>杜预注：“夏，汉别名。顺流为沿，顺汉水南至鄢。”<sup>[12] (p2070)</sup>要言之，灵王进入楚境后将沿汉水南下，前往鄢地。<sup>2</sup>如此公子比如欲截击灵王，郢都必不会位于鱼陂北方的襄宜平原。

综上，公子比之所以驻军鱼陂，就在于郢都极有可能位于其南方，且很可能就在杨水流经地区。江陵纪南城与当阳季家湖古城，恰好都可以凭杨水通达。前文已提及，江陵纪南城的使用年代与为郢并不相符，那么季家湖古城是为郢的可能性无疑最大。需要辨析的是，公子比在楚都自立为王后，公子弃疾欲取而代之，《左传·昭公十三年》载：“乙卯夜，弃疾使周走而呼曰：‘王至矣！’国人大惊。”<sup>[12] (p2070)</sup>此事《楚世家》载：“乙卯夜，弃疾使船人从江上走呼曰：‘灵王至矣！’国人愈惊。”<sup>[18] (p1708)</sup>又，楚穆王九年，楚城濮之战失败后，子西自商密出发将入郢都，《左传》载：“止子西，子西縊而县绝，王使适至，遂止之，使为商公。沿汉沂江，将入郢。王在渚宫，下，见之。”<sup>[12] (p1848)</sup>关于“沿汉沂江”，孔颖达疏曰：“商在汉水北，汉水东流而南入江。子西既至商邑，闻谗不敢居商县，沿汉水顺流而下至江，乃沂流逆上，渚宫当郢都之南，故王在渚宫下见之也。”<sup>[12] (p1848)</sup>沈括《梦溪笔谈·乐律一》考其路线曰：“沿汉至于夏口然后沂江，则郢当在江上，不在汉上也。”<sup>[39] (p22)</sup>按楚穆王在位十二年，先后居睢郢、为郢两地，此时其居地很可能就在为郢。如何理解这两段材料中的“江”？石泉曾考证，古文献中的“江”并不是长江的专称。<sup>[40] (p51-61)</sup>上文已分析为郢不可能在蛮河流域，那么此处“江”有可能指的是季家湖古城附近的沮漳河。

当然，根据乾溪之乱的相关文献记载，仅能推测为郢的大致方位，至于其是否确实在沮漳河西侧的季家湖一带，还需要更充分的证据。楚昭王时期，著名的“吴师入郢”一役亦与“为郢”有关，下文将根据传世文献对楚昭王出奔路线及当时郢都地望再作分析。

## （二）楚昭王“涉睢济江”与为郢地望

楚昭王十年（前506年），吴国联合唐、蔡，长途奔袭楚国腹地。吴军自淮汭舍舟登岸，进入楚国后在豫章与楚军隔汉水对峙，五战及郢，昭王携妹逃亡。<sup>[12] (p2136)</sup>前文已述，吴师所入之“郢”即“为郢”，通过考察吴楚交战地点以及昭王逃奔路线，可寻得有关为郢地望的诸多线索。

据《左传》，当时昭王逃亡路线为“涉睢，济江，入于云中”，最终“奔随”。<sup>[12] (p2136)</sup>睢，即今沮水，发源于湖北保康县，东南流至今当阳市境，与漳河汇合后称沮漳河，再南流至枝江、江陵界中入江。沮漳河之名由来已久，如在北大水陆里程秦简中，秦人称沮漳河东流入沔航路为“章（漳）渠”，当是因为该渠出自沮漳河，<sup>[38] (p112)</sup>可见秦时沮漳河即有此名。又，1981年枝江县曾收购一件春秋时期铜戈，戈上有铭十一字：“章子𠄎（国）尾其元金为其交戈。”章，即“鄣”或“漳”。漳水从枝江流过，如果此戈出于当地，戈铭之“章”很可能因漳水而得名。<sup>[41] (p67)</sup>

早期学者认为当时郢都在江陵纪南城，而沮漳河在其西，故判断平王出逃方向是西走。如杜预注：“睢水出新城昌魏县，东南至枝江县入江，是楚王西走。”<sup>[12] (p2136)</sup>杨守敬《沮、漳水考》云：“以地望准之，楚昭盖西北出，及涉睢之后，又由东北渡沔水而直入云中。”<sup>[42] (p1160)</sup>且不言纪南城的年代与春秋郢都不相符，即从昭王出奔路线来看，其目的地为郢县、随国，当沿江一路向东，如先往西逃至沮漳河一带再辗转折返，不合于常识。辛德勇亦认同郢都在纪南城，他解释吴师入郢之前连接纪南城与沮漳河的渠道已经开凿，在吴师进逼郢都的危急形势下，楚昭王唯有乘船在出自沮漳河下游的“章渠”上航行，继而渡过汉水，东过白水，以趋随国，<sup>[38] (p113-116)</sup>并将此处“涉”作“入”“浮”解。<sup>[43] (p34-43)</sup>按“涉”为会意字，从水从步，象涉水之形，《说文》曰：“𡿨，徒行灈水也，从𡿨从步。涉，篆文从水。”段玉裁注曰：“灈，各本作厉，误。灈或𡿨字也，𡿨本履石渡水之称，引申为凡

渡水之称,《释水》曰:“繇膝以上为涉。”<sup>[44](p567)</sup>那么更合理的解释是昭王乘舟渡过沮漳河,当时楚郢都应在沮漳河西岸。

针对传统观点中的矛盾,石泉曾予考辨,并提出当时楚郢都在宜城平原,古沮漳河更有可能指蛮河,昭王出逃的路线是先涉蛮河,再渡汉江,入于云中,抵达郢县。<sup>[40](p363)</sup>这一路线较之传统说法更为径直。然而前文已论证为郢不可能在宜城一带,且从当时的战事及地理形势分析,将为郢定在蛮河流域也存在一些疑点。如郭德维提出,如果当时郢都在楚皇城,昭王直接向东南就可渡汉水,并不需要先往西南渡蛮河,再折向东南渡汉水。在吴军紧逼的情况下,这一路线亦稍显曲折。另外,吴师入楚后,与楚师战于汉水以北,继而在柏举进行决战,之后吴军再未遭遇大的抵抗,却也还经过了十天才到郢都,如果郢在汉水中游,就用不了这么长时间。<sup>[45](p38-48)</sup>关于春秋时期吴师入郢路线,传世文献记载甚详,但涉及之古地名多难以详考。考虑到吴军在汉水北岸大败子常后,在楚军几乎无力抵抗的情况下,十天后才抵达郢都,而楚皇城正在汉水沿岸的事实,郭氏之质疑是较为有力的。

又《左传·定公五年》曰:“吴师败楚师于雍澨,秦师又败吴师。吴师居麇,子期将焚之,子西曰:‘父兄亲暴骨焉,不能收,又焚之,不可。’”杜预注:“前年楚人与吴战,多死麇中,言不可并焚。”<sup>[12](p2139)</sup>可见吴师入郢前后反复在麇地与楚军交战,此地当与郢都位置关系密切。上博简四《昭王与龚之雎》载昭王云:“天加祸于楚邦,暴<sup>3</sup>君吴王身至于郢,楚邦之良臣所暴骨,吾未有以忧其子。”<sup>4</sup>简文所述吴王及郢而楚臣多战死,当指的是吴师抵达郢都时,楚军“多死麇中”一事,由此知麇与当时楚都较近。<sup>[19](p40-41)</sup>

“麇”地在《左传》五见,皆书为“麇”,在其他文献中也有写作“麇”“麇”“麇”“麇”的。<sup>[46](p226)</sup>其具体地望,前人解释纷纭。一说在今湖南岳阳,<sup>[47](p351-354)</sup>《太平寰宇记》“岳州”条云:“古三苗之地,又为麇子国,春秋文公十一年,‘楚子伐麇’,即此。”<sup>[37](p2297-2299)</sup>此说难以据信。<sup>5</sup>一说在今湖北郢西一带,《左传·文公十一年》记楚潘崇伐麇,至于錡穴,《释文》云:“錡音羊,或作锡。”<sup>[12](p1850)</sup>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均州“郢乡县”条云:“本汉錡县,古麇国之地也。《左传》曰楚‘潘崇伐麇,至于錡穴’是也。”同书“房州”条云:“《禹贡》梁州之域。古麇国之地。”<sup>[48](p544-545)</sup>然而郢西亦明显距离当时楚都及吴、楚战场过远。

一说“麇”地在今当阳市。汉颖容《释例》认为潘崇所伐之“麇”应在“当阳”,<sup>[49](p813)</sup>北宋宋白《续通典》亦谓在当阳。<sup>[50](p3598)</sup>今当阳市境有麇城遗址,或为吴、楚战事之麇地所在。麇、麇二字形近易讹,《左传·哀公十四年》载:“逢泽有介麇焉。”释文云麇“又作麇”即证。<sup>[12](p2173)</sup>麇城遗址位于当阳市两河镇麇城村西北1公里,在沮河西岸约3公里处,南距季家湖楚城约12公里,时代为东周。此城残存面积约4万平方米,城址平面略呈椭圆形,夯筑城垣,底宽约18米,顶宽5~10米,残高6米,南、北两面各有一缺口。<sup>[51](p79-84)</sup>麇城遗址与季家湖楚城距离较近,从地理位置与遗址年代来看均与文献中的“麇”地较为相合。吴军渡过沮河入郢之前,曾与楚军交战,以致楚军伤亡惨重。入驻郢都后,又败于秦军,碍于沮河的天然池堑,慌乱中不能涉沮出逃,只能退于离城不远的麇中。<sup>[52](p283-289)</sup>不仅如此,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当阳县“麦城”条云:“相传为楚昭王所筑……《荆州记》:‘麦城东有驴城,沮水西有磨城,伍子胥造此二城以攻麦城。谚云:东驴西磨,麦城自破。’”<sup>[50](p3598)</sup>据考古调查,麇城遗址附近又有麦城遗址,位于两河镇麦城村东北500米,残存城垣长约100米,底宽20米,顶宽8~12米,高6米,夯土垒筑,时代为东周。<sup>[53](p252)</sup>吴、楚在这一带交战,当非讹传。自1975年以来,当阳、枝江一带中小型楚墓出土大量春秋时期的楚式青铜剑,这些铜剑绝大多数随葬在棺内头向和腰身部位,学者认为当属实用武器。<sup>[54](p44-46)</sup>结合上文对“为郢”附近几次战事的分析,当地出土较多春秋楚剑,或与此有关。

昭王复邦后,曾在麇地筑城。《左传·定公五年》载:“王使由于城麇。”<sup>[12](p2140)</sup>吴楚交战之“麇”与昭王筑城之“麇”当为同一地。《楚居》载:“昭王自乾溪之上徙居媿郢。”媿,整理者释读为“嫩”,指《周礼》古“美”字。<sup>[1](p181,190)</sup>牛鹏涛指出“嫩”“微”皆从“𡗗”得声,音义皆通,又与“麇”字通用,可从。<sup>[47](p351-354)</sup>《公羊》《谷梁》庄公二十八年均载:“冬,筑微。”《释文》曰:“《左氏》作麇。”<sup>[12](p2241)</sup><sup>[12](p2388)</sup>证“微”可作“麇”。上博简四《昭王毁室》载楚昭王新建一室,行将落成,一君子穿戴丧服欲入,告昭王云其父之骨埋于宫室台阶之下,于是昭王毁室并徙居。<sup>[55](p182-186)</sup>这一故事正反映了《左传》中的吴师在麇、昭王筑城于麇地,与《楚居》载昭王居于麇郢为前后相继之事。旧说昭王墓在麦城不远,距麇城遗址亦较近,《水经注·沮水》云:“沮水又南迳楚昭王墓。东对麦城,故王仲宣之赋《登楼》云‘西接昭丘’是也。沮水又南,与漳水合焉。”<sup>[36](p2700)</sup>李

善注《文选》引《荆州图记》曰：“当阳东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。”<sup>[56] (p207)</sup>联系文献中昭王晚年居麇郢之史事，或有所本。

从以上对楚灵、昭王时期相关史事的考察，显然郢都不在襄宜平原，而在沮漳河西岸，其地望很有可能在当阳季家湖楚城一带。

### 三、季家湖古城的年代与规模

季家湖位于湖北省当阳市东南隅，距城区约 40 公里。其西岸南距长江边 15 公里，东距沮漳河约 3 公里，东南方距纪南城约 35 公里，地势低洼。<sup>[28] (p31-41)</sup>从地形地貌观察，季家湖应是沮漳河故道，湖是河流改道后留下来的沼泽。这座城原来也许紧靠沮漳河的西岸而建。城址其余三面中，西、北城垣基址尚存，南城垣保存较好。盛弘之《荆州记》载“吴通漳水灌纪南城”，或有不确，但据高应勤实地勘察，季家湖古城北面属沮漳河流域的冲积平原，在古城北面即当阳窑湾附近，至今还有一个叫“倒口”的地名，如沮漳河溃口即冲击季家湖古城，传说吴通漳水灌郢都之事，与季家湖古城一带的地理形势更为贴切。<sup>[57] (p56-57)</sup>

季家湖古城南北长约 2000 米、东西宽约 1400 米，其形制近似长方形，总面积约在 2.8 平方公里以上。相较于战国时期的楚都纪南城而言，其面积并不算大，但这并未排除其作为春秋中晚期楚都的可能。郭德维指出，一般春秋时期的古城面积并不大，如晋国的都城，已发现六个大小不等的城圈，都相距不远，有的还相连或套在一起呈“品”字形，然每一个城圈长宽都只有 1 公里多，最小的长宽仅三五百米，相较而言战国都城如郑韩故城、燕下都则都很大。<sup>[45] (p38-48)</sup>高应勤亦认为，季家湖古城正与《考工记》谓“匠人营国，方九里”之春秋时代的建制大致符合，同当时列国比较也相差无几。<sup>[57] (p56)</sup>根据上述说法，季家湖古城的规模更加可以证明其可能是春秋时期的楚国都城。

经考古调查，季家湖古城的城址年代为东周，南城壕及城内堆积中除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外，仅见东周遗存，而未见有商或西周时期的遗存。<sup>[28] (p31-41)</sup>古城内夯土台基上出土有一件青铜构件，时代为春秋中期，又有学者认为是春秋早期。类似青铜构件，在陕西扶风的秦雍都遗址也有发现，是先秦宫殿建筑上的青铜拱形包饰，表明此地原有宫殿建筑，并非普通的楚城。<sup>[57] (p56-57)</sup>城内出土的“竞之定救秦戎”钟，载铭文曰：“秦王卑命景平王之定救秦戎。”钟的断代及铭文释读顺序，学界争议较大。一说“景平王”是双字谥，则此器年代当在楚平王死后，为昭王时期之器；<sup>[58] (p23-27) [59] (p56-58) [60] (p87-94)</sup>一说为楚平王族人所作器，当在楚悼王时期；<sup>[61] (p192-201)</sup>也有学者认为是战国中期时器。<sup>[62] (p340-341)</sup>综合该器形制、纹饰分析，学者多认为是春秋晚期器。<sup>[63] (p55-59)</sup>

在季家湖周边，亦有不少春秋中晚期遗存。当阳市河溶镇东南约 4.5 公里处曾发掘有曹家岗 5 号墓，该墓年代为春秋晚期，规格较高，墓主身份应是大夫阶层中地位较高者。其中出土一件铜簠，铭文载：“王孙飠作蔡姬食簠。”一说作簠者王孙飠指昭王时期的申包胥，<sup>[64] (p455-500)</sup>田成方认为可能是楚国异姓贵族。<sup>[65] (p84-89)</sup>黄锡全认为该器年代可定为春秋晚期。<sup>[66] (p149)</sup>考古工作者指出，曹家岗地势略呈十字形岗坡，岗上密布墓葬群，5 号墓并非一个孤立线索，在赵家湖一带分布着十多处内涵丰富、时代清楚的两周文化遗物和数千座楚墓，不同的墓区反映了墓主人的不同身份（即贵族墓多分布于曹家岗、赵家塆一带，平民墓多分布金家山、杨家山等地），这不仅是楚国社会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在“葬制”中的反映，而且说明春秋时期此地已存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城邑。<sup>[64] (p455-500)</sup>

1974 年湖北当阳慈化 1 号墓出土一件“楚子越鼎”，其腹内壁铭文曰：“楚子越之飠觶。”一说“越”字或释为“超”，指楚康王熊招。<sup>[67] (p31)</sup>此说或有不确，楚王作器一般不会称“楚子”，不过由铭文“楚子”可见作器者身份至少是楚国贵族阶层，最高为王之曾孙。<sup>[68] (p75-82)</sup>鼎之年代在春秋中期。

王孙遗者钟，清光绪年间出土于宜都城西山中，后辗转流入海外。据考王孙遗者即楚公子追舒，为庄王之子，楚康王八年任令尹，次年被处死。此钟当作于康王九年正月，即其正在担任令尹期间。<sup>[69] (p41-46)</sup>值得注意的是，江陵境内出土有徐国器沅儿钟，<sup>[70] (p35-40)</sup>其时代、字体乃至铭文内容均与王孙遗者钟极为相似，或系徐王庚之子沅儿客居楚国时，仿王孙遗者钟而作。<sup>[71] (p76-78)</sup>据此，当时楚都颇有可能距二钟之出土地较近。

以上春秋中晚期器皆出自季家湖楚城及其周边，器主身份皆为楚贵族阶层，可证季家湖楚城并不像之前研究所认为的，到春秋之际才成为楚都。<sup>[22]</sup>相信随着考古调查的进展，季家湖楚城在春秋时期的设置和使用情形将会进一步明晰。

## 四、结论

在《楚居》所载诸“郢”中，为郢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：从文王到惠王，至少有九位楚王曾居于为郢，尤其在庄王后期到灵王早期五十余年中，楚王罕见地长期居于为郢而未再迁徙。据此，为郢很有可能是春秋时期楚国核心都城之一，其使用时间集中在春秋中晚期。进一步比勘《楚居》与传世文献有关记载可以发现，传世文献中灵王、昭王所居郢都即为郢，其地理范围当在今湖北沮漳河西侧一带，季家湖古城的筑城年代、城址规模和文化遗存正与为郢相契合。因此，综合《楚居》、传世文献和考古调查三方面的资料，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春秋中晚期楚国都城为郢在季家湖古城一带。

那么季家湖古城为何会成为楚国春秋中晚期的核心都城呢？西周以降，汉水两岸形成独立发展的状态，<sup>[72] (p36-47)</sup>其中汉东分布周王室分封诸国，汉西则成为楚国发展成南方大国的根本基地。楚王之所以能够征伐汉水以北、南阳盆地诸国，同时染指汉东、凌江汉间小国，根本上赖于汉西之地提供的人力、物力资源。因此，楚国政治中心必然在江汉西区域内，亦即楚昭王所说的以“江汉沮漳”为楚望之地，而考古发现的楚国东周时期三大聚落群皆在此区域内。其中，蛮河流域的襄宜地区由于处于楚国与中原连接之要冲，对于楚国北上争霸有重要战略价值，此即楚人所言之“方城以为城，汉水以为池”<sup>[12] (p1793)</sup>，《楚居》之樊郢、鄢郢等皆位于此。而沮漳河中游的当阳、枝江一带，北通鄂西山区，东临汉水中下游要津，下接长江中游地区，其战略价值在于便于楚国巩固对鄂西山区的统治，同时兼顾向江汉平原进一步拓展。自楚先王“辟在荆山”，楚人一方面向襄宜平原东进，控制汉水要津，一方面沿沮漳河南下，将势力向长江流域推进，在吞并散居当地的鄂西诸蛮族基础上，逐渐形成以“江汉沮漳”为楚望的上国基地。新蔡葛陵楚简甲三 11、24 曰“昔我先出自郢，宅兹沮漳”，<sup>[73] (p189)</sup>伴随着楚上国区域的成长，“宅兹沮漳”成为一个相对理想的选择。

为郢从文王时期首次成为王居，到最终成为核心都城，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。庄王以前，楚王在为郢与其他王居之间的频繁迁徙，与楚国政治动向密切相关。庄王晚期以后，楚王有较长一段时间恒居为郢，沮漳河中游一带成为当时的核心都城区。学者指出其原因在于楚国始注意到南方，加大了开发力度，并且春秋中期开始，吴、楚矛盾日益尖锐，水上战斗日益增多，近江湖练水军也成为要务。<sup>[45] (p38-48)</sup>晋、楚北境弭兵，楚国转而开拓南方地区，这固然是楚国政治重心从襄宜地区南移的重要理由；同时，当阳、枝江之地可攻可守，具备较好的自然、军事条件，楚国从沮漳河下游浚引水道连通杨水，建立江汉运河，更增添了交通运输优势。至春秋晚期，楚国面临汉西、汉东乃至汉淮一线以北广大区域的整合，为郢已不能满足这一需求，楚王再次在为郢和其他王居之间迁徙，几经辗转，战国时期的楚国最终徙都于江陵纪南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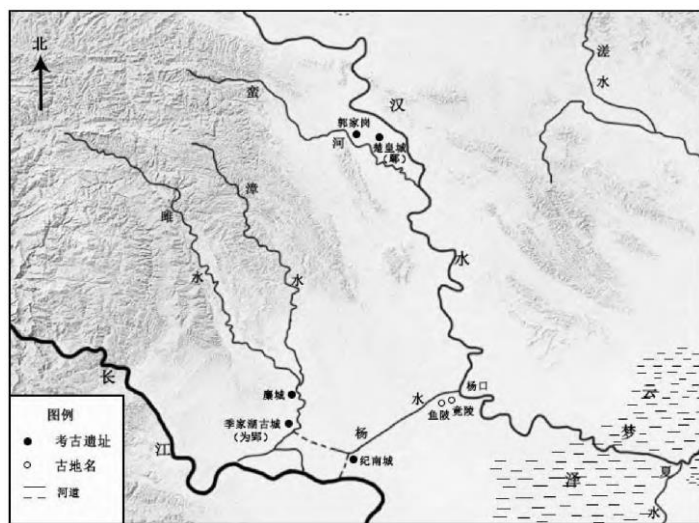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 楚都为郢示意图

**参考文献:**

- [1]李学勤.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: 壹[M]. 上海: 中西书局, 2010.
- [2]黄灵庚. 清华战国竹简《楚居》笺疏[J]. 中华文史论丛, 2012, (1).
- [3]赵平安. 楚居“为郢”考[J]. 中国史研究, 2012, (4).
- [4]牛鹏涛. 清华简《楚居》与楚国都城研究[D]. 北京: 清华大学, 2013.
- [5]辛德勇. 旧史與地文编[M]. 上海: 中西书局, 2015.
- [6]赵庆森. 《楚居》“为郢”考[J].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, 2015, (3).
- [7]黄盛璋. 关于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及其相关问题[J]. 江汉学报, 1963 (9).
- [8]孙朝辉, 李福新. 基于 RS 和 GIS 的楚皇城考古调查[J]. 遥感信息, 2001, (4).
- [9]杨宽.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6.
- [10]赵思木.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壹)》集释及专题研究[D].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, 2017.
- [11]笕浩波. 从清华简《楚居》看“为”郢之所在[J].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, 2016, (4).
- [12](清)阮元. 十三经注疏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7.
- [13]朱晓雪. 《楚居》残简补论[J]. 古文字研究, 2018, (0).
- [14]子居. 清华简《楚居》解析[DB/OL]. <http://www.jianbo.org/admin3/2011/ziju001.htm>, 2011-3-30.
- [15]陈民镇. 清华简《楚居》集释[DB/OL]. <http://www.fdgwz.org.cn/Web/Show/1663>, 2011-9-23.
- [16]魏栋. 清华简《楚居》阙文试补[J]. 文献, 2018, (3).
- [17][日]竹添光鴻. 左氏會箋[M]. 東京: 富山房, 1988.
- [18](汉)司马迁. 史记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3.
- [19]晏昌贵. 从出土文献看吴师入郢之役[M]//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. 纪念石泉先生百年诞辰论文集. 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8.

- 
- [20]尹弘兵. 楚都纪南城探析：基于考古与出土文献新资料的考察[J]. 历史地理研究, 2019, (2).
- [21]王琢玺. 周代江汉地区城邑地理研究[D]. 武汉：武汉大学, 2019.
- [22]尹弘兵. 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[M]. 武汉：湖北人民出版社, 2009.
- [23]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. 湖北宜城“楚皇城”遗址调查[J]. 考古, 1965, (8).
- [24]楚皇城考古发掘队. 湖北宜城楚皇城勘察简报[J]. 考古, 1980, (2).
- [25]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, 宜城市博物馆, 等. 湖北宜城楚皇城城址北城墙 2017 年度发掘简报[J]. 江汉考古, 2019, (5).
- [26]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, 湖北省宜城市博物馆. 湖北宜城郭家岗遗址发掘[J]. 考古学报, 1997, (4).
- [27]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. 荆州纪南城烽火台遗址及其西侧城垣试掘简报[J]. 江汉考古, 2014, (2).
- [28]湖北省博物馆. 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[J]. 文物, 1980, (10).
- [29]（汉）刘向. 战国策笺证[M]. 范祥雍, 笺证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6.
- [30]（宋）王应麟. 困学纪闻[M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8.
- [31]（清）纪昀, 永 2), 等.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：第 312 册[M]. 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, 1983.
- [32]（汉）班固. 汉书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, 1962.
- [33]（南朝宋）范晔. 后汉书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, 1965.
- [34]鲁西奇, 潘晟. 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[M]. 武汉：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04.
- [35]晏昌贵. 秦简牍地理研究[M]. 武汉：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7.
- [36]（北魏）酈道元. 水经注疏[M]. 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, 1989.
- [37]（宋）乐史. 太平寰宇记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, 2007.
- [38]辛德勇. 石室牘言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, 2014.
- [39]（宋）沈括. 梦溪笔谈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, 2015.
- [40]石泉.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[M]. 武汉：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3.
- [41]黄锡全. 湖北出土两件铜戈跋[J]. 江汉考古, 1993, (4).

- 
- [42] (清) 杨守敬. 杨守敬集: 第五册[M]. 武汉: 湖北人民出版社, 1988.
- [43] 辛德勇. 辨楚昭王“涉睢济江”的途程与所谓“江南之云梦”[M]//历史地理: 第29辑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4.
- [44] (汉) 许慎. 说文解字注[M]. (清) 段玉裁, 注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8.
- [45] 郭德维. 楚郢都辨疑[J]. 江汉考古, 1997, (4).
- [46] 何浩. 楚灭国研究[M]. 武汉: 武汉出版社, 1989.
- [47] 牛鹏涛. 清华简《楚居》“媿郢”、“鄂郢”考[M]//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——李学勤先生八十寿诞纪念文集. 上海: 中西书局, 2006.
- [48] (唐) 李吉甫. 元和郡县图志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3.
- [49] (宋) 李昉, 等. 太平御览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0.
- [50] (清) 顾祖禹. 读史方輿纪要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5.
- [51] 湖北省博物馆. 沮、漳河中游考古调查[J]. 江汉考古, 1982, (2).
- [52] 赵德祥, 何怀红. “楚子涉沮”处应在当阳附近的沮河——古沮漳河不可能在蛮河流域(下)[M]//湖南省博物馆馆刊: 第11辑. 长沙: 岳麓书院, 2015.
- [53] 国家文物局. 中国文物地图集·湖北分册(下)[M]. 西安: 西安地图出版社, 2002.
- [54] 余秀翠. 当阳枝江楚墓出土的青铜剑介绍[J]. 江汉考古, 1991, (1).
- [55] 马承源.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: 四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4.
- [56] (南朝梁) 萧统. 六臣注文选[M]. (唐) 李善, 注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7.
- [57] 高应勤. 春秋楚郢与季家湖古城[J]. 华中建筑, 1992, (1).
- [58] 李零. 楚景平王与古多字谥——重读“秦王卑命”钟铭文[J].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, 1996, (6).
- [59] 李学勤. 论“景之定”及有关史事[J]. 文物, 2008, (2).
- [60] 董珊. 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[J]. 江汉考古, 2012, (3).
- [61] 宋华强. 澳门崇源新见楚青铜器刍议[J]. 中文学术前沿, 2011, (2).
- [62] 刘彬徽. 楚系青铜器研究[M]. 武汉: 湖北教育出版社, 1995.

[63]李瑾. 关于《竞钟》年代的鉴定[J]. 江汉考古, 1980, (2).

[64]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. 当阳曹家岗 5 号楚墓[J]. 考古学报, 1988, (4).

[65]田成方. 申氏铜器与楚申氏的族属[J]. 考古, 2016, (12).

[66]黄锡全. 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(增补本)[M]. 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9.

[67]夏渌, 高应勤. 楚子超鼎浅释[J]. 江汉考古, 1983, (1).

[68]黄锡全. 楚器铭文中“楚子某”之称谓问题辨证——兼述古文字中有关楚君及其子孙与楚贵族的称谓[J]. 江汉考古, 1986, (4).

[69]孙启康. 楚器《王孙遗者钟》考辨[J]. 江汉考古, 1983, (4).

[70]李学勤. 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[J]. 文物, 1980, (8).

[71]刘翔. 王孙遗者钟新释[J]. 江汉论坛, 1983, (8).

[72]谭远辉. 试论朱家台西周遗存与楚文化的关系[M]//楚文化研究会. 楚文化研究论集: 第 3 集. 武汉: 湖北人民出版社, 1994.

[73]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. 新蔡葛陵楚墓[M]. 郑州: 大象出版社, 2003.

#### 注释:

1 据《左传》，楚文王自鲁庄公五年（前 689 年）即位，鲁庄公十九年（前 675 年）卒，在位共十五年。《史记》记文王在位十三年，恐有误。相关讨论见杨伯峻编著：《春秋左传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16 年版，第 229 页。

2 与此说不同，唐人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谓“王自夏口从汉水上入鄢也”。（见（汉）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59 年版，第 1708 页）不过，检《说文》“沿”字条曰：“缘水而下也，从水台声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‘王沿夏。’”（见（汉）许慎撰，（清）段玉裁注：《说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 年版，第 556 页）杜注似未可轻废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《水经注》载夏水首受江于江陵东南，东至云杜县东入汉，楚灵王自是不可能顺夏水一段抵达鄢郢。（见（汉）班固：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62 年版，第 1566 页；（清）杨守敬、（清）熊会贞疏：《水经注疏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9 年版，第 2704—2709 页）但汉水下游与夏水合流，以互受通称之例，汉水亦得夏水之名，《读史方輿纪要》襄阳府“汉江”条曰：“其在府境者亦曰夏水，《左传》昭十三年‘王沿夏将欲入鄢’是也。亦曰汉水，亦曰沔水。”（见（清）顾祖禹：《读史方輿纪要》，中华书局，2005 年版，第 3707 页）鄢地在楚皇城遗址，灵王当是顺汉水前往楚皇城一带，今以杜预之说为是。

3 “暴”字从周凤五先生考释，参阅周凤五：《上博四〈昭王与龚之睢〉重探》，载《台大中文学报》2008 年第 29 期。

4 释文参考马承源主编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四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 年版，第 189—190 页；陈剑：《上博竹书〈昭王与龚之睢〉和〈柬大王泊旱〉读后记》，载简帛研究网，<http://www.jianbo.org/admin3/2005/chenjian002.htm>；周凤五：《上博四〈昭王与龚之睢〉重探》，载《台大中文学报》2008 年第 29 期。

---

5 岳阳说与文献记载的相关地理形势根本不合，何浩认为《太平寰宇记》有“麋”地的不同记载，作者或为列举数说以备查阅。参阅何浩：《楚灭国研究》，武汉出版社，1989 年版，第 231 页。